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顾问 任继愈 庞朴

主编 王中江

[美] 本杰明·史华慈 著 王中江 编

# 思想的跨度与张力

——中国思想史论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顾问 任继愈 庞朴 主编 王中江

# 思想的跨度与张力

## ——中国思想史论集

[美] 本杰明·史华慈 著 王中江 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美)本杰明·  
史华慈著.王中江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5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ISBN 978-7-5348-3169-0

I. 思… II. ①本…②王… III. 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8754 号

Sixiang de Kuadu yu Zhangli

思想的跨度与张力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新星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9.5

字数:235 千字 印数:1-4000 册

版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总 序

当回首 20 世纪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摸索和研究历程并前瞻和期望一种新的可能之际，中国哲学的一些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改变现状和获得新的契机的途径。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和学术，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问和学术一部分的中国哲学是什么呢？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来概括它的类型。一定的迹象显示了观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式的多样性，不过要说到在这种多样性中究竟有何种“典型”范式和原创性恐怕就令人踌躇和惶恐了。人们不时地都在抱怨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并相信发现了导致问题的根源，但深思熟虑地检讨和反省则非常罕见，在惊人的说法中却是惊人的轻率和漫不经心。

在此姑且拿“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正当性问题来说。相应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对运用西方范式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生搬硬套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在人们开始对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观察中国哲学这种常见方式产生怀疑的时候，有人甚至对通用已久的作为代表“中

国学问”一个方面的“中国哲学”这一术语本身也发生了动摇。理由好像是说，“哲学”这一概念是“西方的”，它生长于西方并适合于西方，它所承负的那一大套东西都是与西方文化整体联系在一起的，让它成为代表中国一部分学问的化身，就使中国学问丧失掉了它的真实面目和独特性。在这种忧虑之下，拒绝西方观念和范式在中国运用的主张和放弃“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这样的说法如何呢？按照这种逻辑，撇开自然和技术领域，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几乎所有领域所使用的近代翻译过来的大量源于西方的“术语”（许多是通过日本）都得放弃，用这些术语所命名的学科和学术分类都得改弦易辙。

且不说这样做的可能性如何，关键是这样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意义。张之洞很早就拒绝使用“哲学”这一术语，因为他把“哲学”只看成是“西方之学”，因此试图以“名学”或“理学”代替“哲学”；王国维从普遍的立场出发，坚持认为哲学是中国的固有之学，只是用名不同罢了。当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先生用“哲学”这一术语分别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大纲》的时候，他们都认真思考了运用“哲学”概念的正当性问题，并从此出发建立起了为时代刻上了印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按照张岱年先生的处理方式，“哲学”术语源于西方但“哲学”不等于“西方哲学”，因为他把“哲学”视为一个“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都是它的一个“属”。即使在西方，“哲学”概念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概念，就像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一样。如果不从类的观点考虑问题，即使在西方也照样会发生使用“哲学”概念的困境。因为“哲学”术语起源于希腊，如果只能把它与希腊相联系而有所谓“希腊哲学”，那么中世纪之后的“西方哲学”都不能称做“哲学”。“哲学”概念在中国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不能说我们所说的“哲学”就“等于”西方所说的“哲学”。因此，问

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不使用“哲学”一词，而在于如何在使用中不断地为“哲学”赋予新的意义，而在于如何从中国哲学中发现哲学的丰富意义。同样，“中国哲学”也不是固定的产物，它会随着我们不断的理解特别是那种突破性理解而得到“转化”和“转生”。

我们确实需要正视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理解和认识中国学问所带来的许多负面性，且不说在教条化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之下那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但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能通过对术语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严格来说，这些术语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内在部分。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反讽局面，即大量使用着翻译过来的源于西方“术语”的人，却同时又一味地主张放弃这些术语。这样，在他们的这种态度之中，就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要求放弃这些“术语”还是要求放弃他们的立场。我们毫不保留地赞成检讨和反思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并为不能在此做出有意义的工作而忧虑。一种积极的办法是，我们在“谨慎地”并通过艰苦努力以“有效地”运用外来范式的同时，也要努力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出我们所需要的范式来。不从事这种积极性的工作，而只是从表面上做文章，说到底不过是自欺欺人。必须承认，在一种情绪式民族主义和廉价式保守主义之下，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困境，同时也就落入到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陷阱。用这种立场研究中国哲学，我不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鼓舞人心的东西。

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的确需要改变，明智的选择是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变；中国哲学史确实需要重写，谨慎的态度是要真正找到能够带来突破的重写途径。从不少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积累，但这种积累还是远远不够的。客观上越来越要求我们摸索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式并获得突破。公正的历史原则将一如既往地按照它的方式选择我们或者是抛弃我们。

带着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和范式更新的渴望，抱着激发问题意识和主题重建及新领域开拓的期待，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长王关林、总编辑张存威、副总编辑郭孟良和编辑卢海山等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宽泛意义上的“前沿”要求我们的研究能够体现出至少一个方面的特点：或者是新问题、新领域；或者是新范式、新方法；或者是新文献、新证据；或者是新探讨、新观点。即便这样，我们也仍然不敢说列入丛书的著作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承诺，请宽容的读者在一个相对意义上理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我们所说的“前沿”。

王中江

2002年10月24日

# 序

重审 30 年前的这些旧作，我和其他人一样，惊叹于其间的巨大差异性（diversity），即便这些文章全都围绕名为中国的集体人类经验这一广泛领域展开论述。我无意作此断言，认为把这些文章编辑成册，就意味着它们构成了一个首尾一贯的思想体系，或者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相关专著。我仅想表明，起码回顾我个人的看法，它们确实反映了某种深层持久的关注点，以及更多的是对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和一般西方思想的学术转型趋势的直接回应。不论怎样，它们代表了一种如今被通称为“自我关涉”（self-referential）的立场，但不是在某个人个体主观性的意义上使用，而是在若没有对自身文化、社会和历史处境的持续体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Other）的意义上使用。然而，我还得赶紧补上一句，鉴于这些文章企图对中国过去和当前的各个方面作一解读，所以很显然，我不会接受如下观点：这种“自我关涉”必然要么包含教条式的文化相对主义，要么包含中国过去或当前的差异性不是注定不可比较，就是不可言传的看法。



文章所讨论的主题，牵涉的范围和多样性已经超出不同知识领域之间公认的分界，人文科学的这些分界，是在战后确立起来的。这些文章冲破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分界，而在两者之间采取一种持续的互动合作。它们断然不会认同下述两种观念之间的分界，其一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为完全经验式的“事实收集”（fact-gathering）工作；另一视“区域研究”为纯粹社会科学理论。同时，它们亦力图表明，像历史、政治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之间所确立的严格分界，是极度成问题的。虽然学科分析无疑对他者文化的研究极有帮助，但他者文化的研究，亦会对学科本身的分界和因果诉求提出质疑。

然而，这里我无意于提供一纸辩护，而是斗胆给出我自己战后缘何涉足中国研究的个人自述。虽然我的一些立场无疑早已成形，但战后初期，我和我的研究生（他们大多是老兵）在哈佛参与费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所主持的中国项目的研究经历，对我们日后的成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此一时期，中国或许仍然是一异邦他者（exotic Other），但此一他者已经不再遥远。二战期间，我们深深陷入中国内政的纠葛之中；而战后，我们又深深陷入那场最终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而告终的危机之中。实际上，中国业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难分难解的一部分了。

如今，中国这一他者又与世界共产主义这一阴森可怕的他者纠缠在一起。苏维埃共产主义被视为是一异类，但是与之前的纳粹一样，它似乎是对现代西方历史诸多方面的一个演变，并且对仍然视其为全球“未来之潮流”的许多西方人，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吸收力。那么，中国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二者和我们又有何种关系可言？

新近刚从其中国战略情报员任上卸任的费正清，曾经正好赶上了中国最为艰难的那段处境，时值中国国民党政府败退的末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前夜。作为一位“中国通”，他坚信新中国必将对人类未来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他对中美关系的完全破裂倍

感气馁。他极为成功地传达出了他的这种紧迫感，甚至是对那些比他自己更加超然于政治导向之外的学生。然而，我们对当代中国的极度热衷，绝非单单是美国式启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另一种展现。中国和当前最受关注的一些思想问题关联甚深：苏维埃共产主义是什么？它为什么能有其吸收力？它和中国社会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如何解释美国式自由民主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失掉吸收力的原因？如今我们视 20 世纪 50 年代为极度自信的时代，中国却迫使我们转而关注那个时代的另外一些方面，这些方面极其荒谬地为其赢得了“忧虑时代”的称号。

然而，那个时代中较为乐天的表现当属战后社会科学宣言中的自信浪潮，那时社会科学倾向于大胆的全包（all-embracing）理论、模式和范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共产主义极权理论和“后进”（backward）（后来通常指“发展中”）社会全包解释。费正清决心把这些理论和模式展现给我们，它们也许会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提供方便法门。

这些理念和模式极具解释潜力。因而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东方式专制”（Oriental Despotism）理论似乎解释了过去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全部性质，以及中国和苏联的专制的现代极权式样板；而像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教授等其他一些极权主义理论家，则主张把极权主义解释为一种建基于现代物质和社会技术之上的纯粹现代现象。但不论在魏特夫的极权主义和差可称做极权主义的“现代”理论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区别，可在建构未来时，两种理论却无一例外采用了一种拒斥任何内部质变的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

同时我们还领教了其他一些范式和模式，其中包括斯大林式共产主义本身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独特模式。这个模式认为，历史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呈线性进步运动是普适的。这一线性方案如今被莫斯科和北京奉为官

方信条。与“东方式专制”的极权式他者恰好相反，此处我们发现一种对西方和中国社会发展轨道和文化进化所有重要差异方面的消解，除了以下这一尴尬的事实，即中国“封建阶段”的发展异常顽固不化，居然一直持续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前夕。

在随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逐步出现（或者说是重现）了第三种社会科学范式：“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和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现代化理论亦断言社会发展有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普适性道路。它和共产主义一致认为，经济是前进的根本动力。但是，其最终归属，却是一成熟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外加自由式民主。这种发展观既是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同时似乎也是对一种持存不变极权主义观的挑战。斯大林的弃世，赫鲁晓夫的走马上任，以及苏联国家恐怖主义的消退，使得一些发展理论家开始形成这样一种看法，作为后发展（late-developing）传统社会的一个阶段，苏联甚至中国的共产主义，并不能等同于一种稳固不可挑战的极权主义制度。但是，其他一些人则确信，极权主义制度或许真的可以适应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完好无损地保留在差可称做现代性本身另一版本的中心。

除开这些较为重要的范式，我们另外还接触了另一些缘自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甚至语言学的理论。相比社会进化的理论，语言学更看重中国文化特定的显著特征，甚至语言结构在中西之间维持一条不可逾越的认知和文化鸿沟的决定性作用。

在不否认这些和那些假说可能具有启发之效的同时，我必须承认，从一开始，我便已经对潜藏于其下的“科学”主张存有抵制之心。几乎就在我们刚一涉足以中国为名的人类经验的这一宽广领域之时，我们即已被教唆着采取这样一种立场，把无条件的科学家看做“超绝主体”（transcendent subject），他们把中国当做其理论的对象来仔细检查。

实际上，这种抵制意识又为这样一事实所助长，即虽然费正清教授确实非常希望我们接触最新的系统社会科学理论，但他本人却是在一种旧式历史方法学下训练出来的中国学者。这种方法学注重精深的语言学习，以及驾驭中文第一、二手资料的能力，特别是有关 19、20 世纪的资料。虽然这种历史写作学校可能有其自己的“科学”主张，但其中渗透的科学观念却是培根式归纳主义的看法。科学家着手处理事实世界时，基本是借助于一个完全无条件的“白板”（*tabula rasa*），而不是与一种全面的模式在打交道。不论这种实证主义模式有什么局限，但它显著的优点却在于，借助对文本的研究，它能够使我们接触到真正中国人的声音，其中既有尚健在的，也有早已作古的。经常有人断言，这样的文本只能反映小部分政治和知识精英的世界观。虽然事实可能确实如此，虽然为了理解一个民族的所有阶层，相关的努力是必需的，且已经有过一些，但真正活生生的人的缺失，不管是精英还是大众，似乎是我们曾经分析的所有模式共有的巨大缺陷。不管怎样，精英的言行对于证实或是证伪现行的范式，关联甚大。

这里所涉及的不单是原子事实的盲目收集和“理论”的应用之争。以下说法或许是对的，正如波普尔（Popper）所言，大部分事实考察（它预设了我们要选哪些事实进行观察的问题）是有其“理论负载”（*theory-laden*）的，虽然我们亦不能把这种概括加以绝对化。单凭事实就能驳倒一个理论的机会总是有的。虽然中国并非一堆自我封闭的原子事实，而是人类经验的广泛领域和网络。如果“经验”一词系指诸如“鸦片战争”或“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广泛共同经验，我们很快便会发现，想要撇开或明或暗的理论假设而来讨论“经验”，是不可能的。外部强加的范式的普适性权利，必须不断无情地面对具体经验的复杂性的考验，具体经验的复杂性本身也许就能构成对范式的挑战。因而，费正清在这段时期内主持的较为有趣的项目之一，便是他与邓嗣禹（*Teng Ssu-yu*）教授合作完成

的关于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外交文件的编辑和翻译。我发现，比起我们迫不及待欲将之生搬硬套在中国广泛共同经验之上的宏大理论模式，这些文件更令人兴奋，且更具启发意义。

不论这些文件中所使用的范畴有多陌生，但是它们仍旧把我们引入了我们所谓“外交事务”名目之下的古老的中国话语（discourse）。它们亦引起我们对 19 世纪初期中国国内政治复杂性的关注，以及对个人人格影响力的关注。虽然有些立场反映了无所不包的“东方式专制”倾向，但是还另有一些与上述概念似乎毫不相干的立场和政策。

随着我们零星地、艰难地掌握了阅读中国文献的能力，我们有种进入一个全新复杂多维世界的感觉。诚然，这是一个阐述政治和思想的世界。我们所读的大部分东西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这种语言中满是翻译西方概念而生造的中 - 日（sino-japanese）新词。虽然说这是“现代汉语”，一种回应西方的语言，此一事实殊无可疑，但我们究竟能否理解它，这一问题却悬而未决。那些术语的意义果真能够通过汉语新词得到传达吗？事实上，如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德里达对由像中国这样的无语音书写系统的书写功用所带来的深层差别的思考。然而，不论会有多少困境，不管会犯多少错误，我们或许还会冒失地以为，解释过程中的模糊之处与西方文化内部也许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撇开他们个人的偏见不论，这些文献仍是了解 20 世纪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甚至社会史的主要资源之一。

费正清的方法不仅激发起我们研究后“五四”中国白话文的兴趣，还进而引发了我们研究晚清中国业已废止的文言文的热情。为了理解 20 世纪转型期的中国，就必须理解晚近传统文化的内在衰败过程。虽然费正清自己的旨趣落在对晚清帝国及其对外关系的研究上，但他并不反对我们中一些人对于思想史的兴趣。在研究传统中国时，费正清本人走向了系统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社会和文化的

连贯性。然而，在研究衰败时，我们就不仅得研究一贯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而且还得研究极为琐碎的事件史。衰败是一随时间逐渐展开的过程。这里我们必然就不能只执著于制度化蓝图，还得注重政策和利益的作用。个人动机、人格，甚至观念的风向在这里都可能对现实产生决定性影响。鉴于他们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文件和文献因此而变得不可或缺。

在研究传统文件的过程中，我们遭遇上另一种语言和世界，比起20世纪“白话文”文献，它要更难接近得多。不论是官方文件的语言，还是文人的思想话语，都统统沉入一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习惯用语之中。文件的话语中满是与古老争论息息相关的术语。其中随处都会碰上现行词典解释不了的暗示和比喻。就思想史方面而言，虽然儒家思想是18、19世纪思想的主流，这一点是不争的共识，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儒家，是建基在对诸如《论语》等文献的少量假定没有疑问的称引或误引之上的。实际上，我们所阅读的文献，包裹了数世纪注解学工作的外衣。不论我们的理解有多局限，但很显然，当论及什么是对数百年前的错误解读时，这些文人之间分歧甚大。对《论语》的解读或误读，对于阅读这些文人而言，是根本不够的。个中不足，比起单凭阅读《路加福音》就想完全理解托马斯主义者和奥卡姆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抑或那些论争是怎样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整个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发生联系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像“东方式专制”或“传统社会”此类术语，对于理解社会的特定持存方面或许有所助益，但它们对于理解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差异和张力，代际冲突或当前事务，却鲜有帮助。

虽然文献研究对简单社会科学模式的有效性构成严重质疑，但有关他者文化不可传达的另外一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首先有语言决定论和文化相对主义方面的根基，其次还得到后现代思想的特定倾向的支撑。我们是否真正理解我们所读的东西？尽管有翻译的模糊性问题和“文化—界限”的现实问题，许多人还是坚信，掌

握其他文化话语背后的关注点是有可能的。差异始终存在，但却并非绝对不可企及。

对真实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关注，不仅与我们对中国当代史及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的关注紧密相联，而且与我们对其文化历史（cultural past）的理解息息相关。然而，这种倾向既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主导的社会科学理论主张针锋相对，也与后现代解构主义者对任何超文化“人文主义”（humanism）的拒斥背道而驰。

在不作任何深层哲学分析的情况下，我想澄清一下我所谓的人的意识在文化研究中的作用。我用“意识”一词，不仅与认知语言有关，而且还与意志、感觉以及意图行为语言有关。这里所涉及的人的意识是指个体可能犯错的意识，而不能等同黑格尔式的理念。它假定意识可以服务于旨趣，理性化旨趣。它还可以有对真理的诉求。理念既可以超越旨趣，也可以服务于旨趣。它可以无反思地存在于特定的作为“集体精神”（collective mentalities）的一贯文化倾向的界限之内，抑或以一种反思 - 解释学方式来应付这种导向。它甚至还可以拒绝自身的文化导向，转而接受外来的文化倾向。当然，它与自然的和社会政治的外“力”世界，与完全偶然的情境，始终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最后，远未能与理想和光辉理性划清界限的意识生活领域，同时亦是一个充满显著的不确定、模糊性、异化和道德冲突的领域。受限于其文化、历史处境、阶级、地位以及心理气质的同一类人为何会有对真理的要求，并且依照这些要求进行行动这一点，不论对我们，还是对中国古人和现代人，都是一未解之谜。至于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事件的结果的困惑，这对他们来说，亦是问题。这里没什么特殊有利地形可言。当我发现自己和中国古今之人同样关注于这些问题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紧迫感以及由共产党掌权所带来的刺激，我很快发觉我的第一份研究工作聚焦在了 20 世纪历史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上面。

在处理当代情境时，我们必须阅读大量由记者所写的报告集，

接触向我们提供有关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丰富资料的政府要人。一些胆大的记者甚至为我们提供了同一混乱时期城乡大众所受苦难的清晰严酷的记载资料。然而，没有人一贯致力于对事件中中方当事人意识立场进行深度挖掘，唯一值得关注的例外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该书用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他对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采访。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让人见识了这一著名政治人物，他在随后的中国共产主义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毛泽东的自述，斯诺似乎把它当成是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历史的一种官方权威解读。毛泽东的自述中充满了暗示，以及与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思想话语世界的关联性。如果不参照与整个 20 世纪政治、社会以及思想史相关的书籍、期刊和政治文件等大量文献，就不可能重构对毛泽东立场的精准报道。这些文献不仅反映出当事者头脑中的理念世界，而且反映出这些理念是怎样与团体和个人的旨趣激情进行互动，以及怎样与顽固的外部现实和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产生冲突的。

在有关共产党人胜利前夕中国的报道文献之中贯穿着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实际上是从莫斯科取得其战略和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抑或他们是否是中国革命的代表，这种革命可能最终朝向多少较为“自由”或社会民主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朝向斯大林式共产主义方向。庞大的“共产主义”学派中的狂热分子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明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词汇，他们对斯大林的精神性权威，也显见是认可的。那些强调中共延安战略之“中国性”（Chineseness）的人，通常依靠他们自己的考察，指出延安经验中那些似乎标志着对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形象的明显背离的特征。延安战略的许多特征同时也与一种糟糕的民族主义统治政治和政策截然相反。美国许多自由主义评论者认识到但夸大了他们视做“自由”民主制度之端绪佐证的意义。作为有现实感的记者，借助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经验的行为，而非对他们马克思列



宁文献进行模糊的抽象，他们希望中国革命将会朝着他们眼中更为有利和独立的方向发展。

我本人早期研究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部分文献的工作使我相信，唯有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历史的研究，才能为我们提供意识形态信条如何切实影响行为的真正证据，而这种研究又必须以对共产主义运动与20世纪前几十年的具体历史环境之间关系的文献研究，以及对其与发起运动的个人和团体的关系的文献研究为基础。对文献的解读本身便是一碰运气且受限制的工作。作为一项对“精英先锋”（elite vanguard）的研究，它必然没有解释为共产主义提供“群众基础”（mass - basis）的那些人的“精神”（mentalities）。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意识，领导阶层的“精神世界”在何种程度上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范畴的影响，这种范畴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真实人在具体情境操作中的重塑与曲解，以及各种动机对其活力的赋予。

到我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截稿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毛主席业已公开打出其“一边倒”的政策，随后几年中国国内的发展似乎印证了苏维埃体系强加于别人的绝对权力。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一度曾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生活领域的各方面不断将苏维埃模式进行吸收消化而得到强化，这似乎再度证实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权力，以及塑造掌控了这一体系的苏维埃领导阶层的战略智慧。

对于许多冷战的修正主义者而言，苏联在经历二战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极度挫伤之后，不可能去致力于全球的征服，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是笼罩战后世界的并非苏联的物质力量，而是“体系”或其意识形态的道德和“科学”力量。对于西方许多有着宗教倾向般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来说，正是这些理念本身拥有一种黑暗撒旦似的力量。然而，在许多世俗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眼里，较之表面的意识形态，这种权力更多是基于深层的“行为法则”（operational code），